



刘恒《窝头会馆》女性书写研究

A Study of the Female Writing in Liu Heng's *Wotou Hutong*

YIN,XINGCHENG

殷星丞

22ALB00672

指导教师： 李树枝 师/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25

目录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3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6
第四节 研究范围.....	7
第五节 研究方法.....	7
第二章 “规训权力”视角分析《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	9
第一节 规训的空间与规范：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	9
第二节 规训下的挣扎与牺牲：女性坎坷命运的表现.....	13
第三节 小结.....	16
第三章 “话语权力”视角分析《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	17
第一节 “话语权力”在女性角色塑造中的体现.....	17
第二节 “话语权力”中女性角色背后的深层意涵体现.....	20
第三节 小结.....	25
第四章 结语.....	26
参考文献.....	27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殷星丞

姓名：殷星丞 YIN, XINGCHENG

学号：22ALB00672

日期：10/12/2025

论文题目：刘恒《窝头会馆》女性书写研究

学生姓名：殷星丞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刘恒，北京著名剧作家、小说家。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所创作的话剧《窝头会馆》，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同时也受到学界很多学者的认可。在仅仅只有两个小时的表演中，剧中通过真实的表演，以小院中的日常生活作为主线，其中再穿插不同事件下的情节表现，展现出了一众底层小人物在当时的艰难生活场景。

《窝头会馆》的上映，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更是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人民的生活有了新的希望。论文通过分析《窝头会馆》中的女性角色，辅以福柯提出的“规训”以及“话语”权力，进而探究刘恒是如何塑造《窝头会馆》中的这些女性角色。

论文主要由绪论以及正文两章组成。正文部分主要通过从福柯的“规训”和“话语”理论两个方面，对《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进行主要分析。第二章中具体分析了在规训视角下，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她们的坎坷命运。第三章中具体研究了在话语视角下，女性角色的塑造，以及这些塑造结果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意涵。

【关键词】刘恒；《窝头会馆》；规训权力；话语权力；人物塑造

致谢

难忘恩师，难忘挚友，三年的时光匆匆而逝。

感恩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在选择导师时能够接纳我，能够包容我对于论文题材进行多次修改，并在我整个论文期间对我的论文进行多次指导，并严格进行字字检阅，谢谢您。

感谢我的朋友，作为同样中文系的学姐。在我论文撰写期间，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寻找方面的建议，让我能够更好的找到适合用于我论文方面的知识理论，谢谢你。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予我出国学习的机会，是他们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给予我鼓励，他们永远是我最强硬的后盾。

第一章 绪论

《窝头会馆》是刘恒于 2009 年创作的舞台剧，也是其首部作品。《窝头会馆》作为刘恒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所创作的话剧，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话剧主要讲述了一个名字叫窝头会馆的小院中的故事。小院的房东苑国钟靠着收租、酿酒、腌咸菜为生。曾经的清朝举人古月宗，靠着转房契时耍下的文字游戏，赖在这个小院白住了二十多年。还有整天催捐税、抓壮丁的肖启山，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将这座小院以及街坊们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小院中还有两个整天掐架的女人，她们一个是前清朝的格格金穆蓉，跟随丈夫私奔到此，另一个是做过“暗门子”的厨子的媳妇田翠兰。在《窝头会馆》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有人信弥勒佛，有人信基督，有人信钱，有人信“悬壶济世”，正是在这不同的选择中，我们看到了田翠兰的坚毅与善良，也看到了周子萍作为新时代女性对理想的追求。因此本文将从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规训权力”与“话语权力”两个角度出发，研究《窝头会馆》中女性的命运坎坷，以及从社会环境视角出发解读出作者表达的深层意涵。最终通过该篇研究了解到，剧中女性在面对时代变迁中对希望的追求，以及在面对苦难时的共同一心，还有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更替。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话剧作为戏剧的一种类型，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将戏剧定义为“通过演员表演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的艺术。”¹而话剧的定义则是“用对话和动作来表演的戏剧。”²由此可见话剧作为戏剧的一种类型，是通过自然对话将日常生活融入到表演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用模拟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取代了原有循规蹈矩的“方程式”动作，更多展现当代故事。³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更着重于展现当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通过剧中人物之间的互动以及场景的刻画，将观众们拉入到编剧为大家创造的虚拟空间中，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剧中想表达的思想内涵。中国话剧从二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 1407。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页 565。

³ 马森，《戏剧：造梦的艺术》（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页 17。

十世纪由西方引入至今，算是中国一种精妙文化。为了和中国传统戏剧有所区分，故而将其称之为“话剧”。

刘恒，北京人，出生于1954年5月11日。自70年代创作以来，迄今为止能够确认是他创作的舞台剧有两部，分别是话剧《窝头会馆》和歌剧《山村女教师》。从表面上来看，虽然他的舞台剧创作数量并没有那么多，但在创作质量上可以称得上非常突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对刘恒的评价是：“一个作家的话剧剧本处女作拿来就能用，全国不会超过两三个人，刘恒就是其中之一。”⁴由此可见，刘恒自身的文学功底、戏剧创作与人物塑造能力已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因此，笔者选择了刘恒创作的《窝头会馆》作为研究对象。他并非一位单纯的剧作家，而是以小说家与编剧的身份进行跨界创作，并将其对人性的洞察、对语言精妙的掌控以及对底层社会生存困境的持久关怀无缝融入戏剧舞台，例如笔者所研究的《窝头会馆》。

该话剧将叙事焦点对准了1948年北平一座破败的四合院，通过描绘田翠兰、金穆蓉等一众底层小人物在时代碾压下生存挣扎的情景，来展现出剧中人物的人性光辉。

《窝头会馆》不仅继承了北京人民艺术学院“京味话剧”的衣钵，更因为其浓烈的现实关怀和对人性的剖析，使其成为了新世纪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一部标杆之作。而所谓“京味话剧”，顾名思义，是指那些表现出独特的北京地方风情和文化韵味的话剧作品。⁵从观众的视角来看，整部剧更像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也能引发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福柯作为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同时也被西方称为当代最具挑战性和批判性的思想家之一，在学界也有学者称其为知识领域的“思想怪杰”。福柯的理论在学界广受女性主义者喜爱，经常被用于女性书写或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因此本研究将以《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作为研究对象，以福柯的“规训权力”与“话语权力”两个理论作为研究视角，探究刘恒在话剧中的女性书写。

⁴ 〈作家刘恒打造《窝头会馆》〉，中国青年报，2009年8月18日，浏览于2025年7月23日
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9-08/18/content_2808821.htm

⁵ 甘海岚、张丽娟著，《京味文学散论》（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页141。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笔者在 CNKI 中寻找有关《窝头会馆》的相关文献，共找到文献二十一篇。其中与笔者今日所研究内容相关文献共计三篇；其次，关于女性书写研究文献二十四篇，其中有三篇研究文献涉及本文所研究内容；关于福柯理论的相关文献七篇，其中涉及研究的有二篇。从找寻的文献资料中发现，并没有关于直接对《窝头会馆》女性书写的研究文献，因此笔者将通过以上文献进行简要概述与分析，来协助笔者进行《窝头会馆》中女性书写的相关研究。

一、《窝头会馆》相关文献

周菊芹的《北京人艺话剧《窝头会馆》中小人物生存困境解析》。这份期刊主要讲述的是作者对于剧中底层人物在 1948 年北平的生存困境的解析。作者在文章中认为可以通过“贪欲”、“信仰”、“死亡”这三条线索来展现话剧中小人物的挣扎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作者在文章结尾说的：“这些人在绝望之余对未来又怀着深深的期待与憧憬。”⁶该学者在角色分析中提出的三个视角，为笔者之后对剧中女性角色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相较于周菊芹的研究方向，学者何明敏的《去雅从俗的“京味”话剧《窝头会馆》》则更倾向于从语言方面对《窝头会馆》进行研究。这份期刊主要是通过对剧中人物“俗”的生活与语言，来探讨该剧是如何体现这群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者通过与老舍作品的对比认为，《窝头会馆》中的人物书写并不是一味的对人物进行道德批判，而是理解与同情。⁷这也体现出刘恒在对底层人物的书写上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这篇研究通过用不同作品的对比从另一种角度研究《窝头会馆》，始笔者可以根据此类方法寻找新的研究视角。

与上述两人的研究方向相比较，学者罗雅文与张跃勇的期刊《浅析《窝头会馆》的艺术特色》中，将剧中的台词、人物的性格以及剧中故事发展的线索作为研究方向。研究中提到“浓浓的京味儿台词是本剧的一大特色。”⁸通过作者对该话剧的评价来看，刘恒将剧中人物的性格以及所展现的地域文化，通过生动的语言展现在观众面前。根

⁶周菊芹，〈北京人艺话剧《窝头会馆》中小人物生存困境解析〉，《戏剧文学》2018年第3期，页90。

⁷何明敏，〈去雅从俗的“京味”话剧《窝头会馆》〉，《当代戏剧》2015年第2期，页18。

⁸罗雅文，张跃勇，〈浅析《窝头会馆》的艺术特色〉，《曲艺杂谈》2017年第7期，页57。

据该篇期刊的内容，笔者认为可以在研究女性书写部分，从语言方面入手研究，以此完善整篇论文的研究结构。

二、女性书写相关文献

刘思谦在其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女性文学》中提及“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存在的争议。作者认为女性成为“问题”，本身就是女性不幸的一种体现，从中反映出的是一种性别的不平等问题。作者从两性关系的演变历史作为突破口，指出了“自父权社会以来，出现了漫长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关系。”⁹在文章后半部分，作者认为“研究应避免陷入性别对立，而应聚焦女性自身的体验与声音，揭示被压抑的真实。”¹⁰因此笔者认为这份期刊可以更好的帮助理解何为女性文学以及之后更好找到女性书写的切入点。

谭梅在《社会性别维度下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女性书写研究》中，从社会性别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书写所存在的众多复杂问题，其主要关注点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书写。作者指出“女性文学研究应超越作家性别，聚焦于对男权文化的批判与社会性别的建构。”¹¹同时，作者也提到在文学创作的叙事方式上，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又存在着不同写作方式。因此，笔者认为这一份资料能够帮助理解刘恒在创作这些女性角色时的所思所想。

曹晨光在《悲惨命运的女性书写》中提出，女性的命运与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作者的观点中“无论是农村妇女还是知识女性，都无法摆脱封建礼教、男权社会的压迫。”¹²文章中作者通过对不同文学作品中的角色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中国女性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通过举出的相关例子，强调女性在经济和独立方面的重要性。根据作者对悲剧色彩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其分析方式，从而完善笔者在女性书写研究中的悲剧色彩部分的理论支持。

⁹ 刘思谦，〈关于中国女性文学〉，《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页61。

¹⁰ 刘思谦，〈关于中国女性文学〉，页68。

¹¹ 谭梅，〈社会性别维度下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女性书写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页62。

¹² 曹晨光，〈悲惨命运的女性书写〉，《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页101。

三、福柯理论相关文献

范莹莹在《从权力/身体看福柯与女性主义》的论文中指出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身体谱系学”、“规训社会”等概念对女性主义相关理论的建构有重要影响。论文通过不同的主题对福柯理论中女性主义进行全面的分析。作者指出“批判地吸收成为女性主义在借鉴男性理论家思想史，必不可少的环节。”¹³笔者认为，这篇论文为研究《窝头会馆》提供了良好的批判视角。特别是可以通过“权力如何通过身体运作”以及“女性如何通过身体回应权力”这两个方向帮助笔者更好的了解剧中对女性角色的书写。

戴蓓芬在论文《福柯主体理论及其女性主义应用》中，使用不同学系的理论知识来分析福柯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其次，在后文的章节中提出，当代女性主义不应该将“女性”这一主体完全抛弃，而是应该将其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建构产物，从而对其进行持续批判。正如作者所说“女性主义之所以重视福柯主体理论的意义，原因在于福柯的主体理论正是对本质化、实体化与抽象化的启蒙主义主体观的批判。”¹⁴笔者认为该论文为分析《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同时也能更好的分析在性别、阶级、权力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剧中女性是如何生存的。

综上所述，虽然没有直接的研究文献成果，但学者们对各自研究的主体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笔者的研究仍然有着很大的参照。综合参考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笔者将尝试从福柯的“规训权力”与“话语权力”两个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分析《窝头会馆》中女性的人物塑造、生存处境、命运轨迹等方面，进而探讨刘恒作为男性作家在女性书写中的立场与策略。

¹³ 范莹莹，《从权力/身体看福柯与女性主义》（安徽：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页46。

¹⁴ 戴蓓芬，《福柯主体理论及其女性主义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页116。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 2009 年推出了由刘恒创作的话剧《窝头会馆》。该话剧将老北平的一座小院作为故事背景，讲述了这座小院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剧中那几位生动形象的女性角色，在笔者看来她们不但是情节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时代音符的传递者。正是以为这部话剧的特殊性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在观看完全部内容后，也是引发了笔者对于剧中女性书写的思考。

在话剧中编剧刘恒并没有将女性的苦难简单直白的描绘出来，而是通过与男性角色的互动来体现底层社会小人物之间相互依存的生活常态。然而，大多数学者更偏向于对《窝头会馆》中的语言特色、叙述结构、男性人物或者演出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反而忽略了剧中生动形象的女性角色，对剧本中的女性书写研究尚有不足。因此，本研究将选取《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目的是为了分析刘恒是如何塑造田翠兰、金穆蓉等女性角色的。同时，通过她们的语言、行为、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剧中女性命运的坎坷和其更深层次的意涵。

另一方面，与许多故事背景同时期的作品相比，《窝头会馆》并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将男性的权力斗争作为主要内容事件，而是通过平静的视角将画面转向小院中的普通百姓。特别是小院中的女性角色，她们的日常争吵、帮忙，看似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却真是的反映出了当时年代的变化。刘恒通过这种与常人不同的叙事方式，表现出这些女性角色的善良与聪慧，同时也不避讳的展现出她们在那个时代的窘迫与无奈。也正因如此，本研究想要通过聚焦于这些女性角色的塑造和深层含义，尝试填补目前学界相关研究的空缺。同时也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话剧与诗歌、小说一样，能够通过这些独特的方式来展现人物内心的世界，以及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综合上述目的，本研究将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 一、刘恒是如何在《窝头会馆》中塑造女性角色，以及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 二、探究《窝头会馆》是如何展现处女性角色的坎坷命运和深层意涵？

第四节 研究范围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话剧艺术在现实主义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涌现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性复杂的佳作。刘恒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戏剧界的重要作家，其创作的《窝头会馆》中将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以及剧中角色语言艺术展现的真实而又具有深层意蕴，同时前文提到学界对于其《窝头会馆》的专业性保持高度认同。所以该话剧可研究价值极高，不仅如此，话剧中所创造的女性角色更能体现当时社会环境的艰苦。而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倾向于研究剧中的艺术特色或是舞台艺术表现，视角存在局限性。所以，本研究将运用福柯的“规训权力”与“话语权力”两个理论，对剧中女性角色进行剖析。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篇论文，将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研究：

首先是该剧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方面。¹⁵ 可以理解为刘恒作为创作的主体，而当时剧中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客体，因此在创作时必然要根据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为作品的创作依据。正因如此，笔者将通过这一方法简要的说明刘恒的成长环境、政治时局等方面在其创作《窝头会馆》时起到的影响作用，进而可以让笔者能够更好的去解析《窝头会馆》中的深层价值。

其次是文本细读法。语言表面上是用于交流的工具，但更深层次的理解是情感表达的载体。了解文章要从最根本的语言入手，品读句子，句句斟酌，思考文本中表达出的文化、思想、情感。“剧本是叙事文学的一种，它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现实。”¹⁶ 剧中故事虽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创作的风格仍然透露着刘恒的影子。由此可见，刘恒的创作风格可以用文本细读法从剧本中的人物塑造、性格、思想以及生活环境等方面分析得出。此外，王先霈曾说“细读法”是为了要抓住词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等。¹⁷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将剧本中的人物以及故事背后所蕴含

¹⁵ 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文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页 185。

¹⁶ 转引自王琬，《文本细读法在高中戏剧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探究》，页 29。

¹⁷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154。

的哲理进行剖析。本篇论文的目的正是通过多重压迫理论去分析《窝头会馆》中刘恒在女性书写中想要表达的精神内涵，以及角色行为所体现的深层含义。同时，笔者还将对戏剧类资料进行文本细读，以了解《窝头会馆》作为戏剧类作品，在舞台和剧本中对人物刻画的要求。因此，“文本细读法”适合于本篇论文。

最后，笔者会采用福柯的“规训权力”与“话语权力”两个理论。“权力借助于这种规训技术和战略，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受监视和约束，这种规训是日常的、内在的。”¹⁸《窝头会馆》整体来看，主要讲述的就是底层群众在动荡的社会中，生存的挣扎以及对生的希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剧中的女性角色也符合福柯理论中被规训的群体，她们听命于男性，表现出了艰苦环境中的坚持、在陈旧观念中的周旋、以及被困在情感之中的默默承受。

¹⁸ 孙米莉，〈空间、知识和权力——基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的文本解读〉，《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页50。

第二章 “规训权力”视角分析《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了“规训权力”这一理论：“规训权力主要功能是‘训练’，通过对空间、时间、身体的训练，将个体塑造为符合社会规范的‘驯顺的肉体’。”¹⁹福柯通过这一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这样一种持续的、微观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权力区别于常规的权力体现，不再是明面上那种采用暴力进行压制，而是通过对时间的控制、空间的分配以及身体的训练等隐含的手段，在潜移默化间对目标个体进行“训练”。福柯认为规训因该根据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模式来进行调整。²⁰《窝头会馆》中女性角色的生存环境与福柯理论中所描述的规训机制具有相同之处，她们的生存轨迹被家庭、阶级以及道德观念所编织的权力大网牢牢的捆绑在这个小院中，而其身体、命运也成为了“规训权力”的实践场地。本章将通过剧中女性角色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个体命运两个层面，对《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进行深度分析。以此来揭示“规训权力”是如何渗入到她们的日常生活，且为她们塑造一个悲剧性的生存状态。

第一节 规训的空间与规范：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

福柯认为，规训权力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主体在空间层面对目标，进行有序的分配与管理。例如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福柯将“规训”一词用来代指18世纪的军队、监狱、工厂等体制中的一种新型权力机制，其提到的监狱、工厂等大多管理方法中都有着在空间层面的管控。在《窝头会馆》中，这些女性角色的活动空间也如同监狱或工厂一般，被严格的限制在了一个固定空间之中。有的是家庭院落，有的是邻里胡同，在这一个个看似日常的微观社会单元中，却藏着一张巨大的规训大网，牢牢的笼罩在剧中的女性角色头上。

一、规训权力在微观层面的表现

剧中的窝头会馆是一个外观看上去破败不堪的四合院，它不仅是一个物理层面的居住空间，更是一个充满着权力关系的场所。对于剧中居住在这个小院的女性来说，

¹⁹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页193。

²⁰ [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页155。

家庭空间便是这个小院中一个重要的规训场所。剧中田翠兰的主要活动范围大多围绕着西厢房的伙房、煤堆和洗衣盆，在剧中她的身份被绑定为“厨子妻”和“母亲”，在剧中她的价值只体现在操持家务和饮食上。当她通过与苑国钟产生暧昧关系试图摆脱这一身份时，便立刻引起了女婿关福斗的强烈反应。在剧中当关福斗碰到田翠兰与苑国钟暧昧时说：“我活该恶心！我瞎眼了我什么都没看见……我认倒霉我领媳妇走人！明儿我孩子生出来姓关不姓王……”²¹，同时她的这种行为也遭受到了邻居金穆蓉的鄙夷。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家庭空间也就成为监视与束缚田翠兰的规训场所。同样，身处同一小院的金穆蓉作为一个没落的旗人以及天主教徒，她的规训空间则是东厢房那间“干净得要命”²²的房间，以及她内心所坚守的宗教仪式。在剧中她通过将自己的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悬挂十字架以及参与弥撒等行为，试图在这个胡乱的时局中找到一丝曾经身份的优越感，而这本身也是对自身以及他人进行的一种规训化的管理方式。然而，当金穆蓉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在私下里从事接生行当时，这也导致了家庭空间要与外部社会承担共同的风险。正是这样一种规训倒逼了金穆蓉“越轨”行事的产生，成为了当时社会规训空间的一种微观缩影。

年轻的周子萍与王秀芸，她们的规训空间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作为大学生的周子萍，她的理想和行动空间本来应该是校园和社会，但每一次的回家，都会面临着母亲金穆蓉想要将其拉回到传统家庭轨道的压力。并且金穆蓉还阻止她与楼上的苑江淼相互来往，在剧中曾警告周子萍“唾沫星子都能染上痲病”²³。这不仅是其表面上对疾病的恐惧，内在更是一种对女儿跨越阶级界限行为的规训。同样，剧中的王秀芸则是因为怀孕而被当成了家族延续的希望空间，因为怀孕而倍加受到母亲田翠兰的格外关注与保护。就像剧中所展现出的“小心肚子”成为了她的最高准则，而她的身体价值则被规训成了生育的工具。这也导致了王秀芸的个人欲望和感受遭到压抑和忽略。

不仅如此，邻里关系同样也是家庭规训力量延伸的表现。在这个小院中，每个人都时刻处在他人的凝视之下。就像田翠兰与金穆蓉，两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口角或是暗中较劲，这是两种不同生活理念以及道德观念的碰撞与相互规训。在剧中田翠兰用“阿弥陀佛”来对抗金穆蓉的“哈路利亚”，不仅是在言语上有所对抗，实际

²¹ 刘恒，《窝头会馆》（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09），页36。

²² 刘恒，《窝头会馆》，页1。

²³ 刘恒，《窝头会馆》，页28。

行动中也有所体现，例如田翠兰在门框上钉上弥勒佛来对抗金穆蓉的十字架。这些行为看似荒唐可笑，但内在则是她们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体现。而这种邻里之间的相互监视与评判，同样组成了一张无形的规训大网，使得她们为了不遭受到谴责或是遭到身份的贬低，不得不做出一些规训他人的行为。这也代表着她们每一个人都受制于权力，也行使着权力。²⁴

二、 规训权力的意识形态枷锁

剧中所展现出的社会规范以及道德观念，被当作是规训权力的一种思想工具，无时无刻不在对剧中的女性角色进行着规训与塑造。

在规训女性的规则中有两个核心要点，分别是传统的性别角色与家庭责任。剧中，女性的身份无论是贫或是富，其首要身份都会被定义为妻子、母亲或女儿。田翠兰在剧中的形象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家庭妇女，在这个形象的背后是她对及家庭毫无保留的辛勤付出。即便女婿对她的行为感到不满，但她仍然能够理直气壮的说“那是我孙子，谁抢我跟谁玩儿命”²⁵。此处母亲的责任和家族延续成为了她在这个剧中存在的终极意义。同样，金穆蓉则是通过对旗人礼仪的坚守和对天主教的信仰，在这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艰难的维持着自己的那一点“体面”。她对女儿周子萍的管教，表面上是对其“大家闺秀”行为举止的期许，但内在里则更多的是害怕女儿的行为会导致家族有失风范。也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下周子萍，即使有着追求进步的思想，在家中也不得不面对母亲以“担忧”为名而施加在其身上的规训。

此外，规训权力运作的残酷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道德评判与污名化。田翠兰曾为“暗门子”，她的这个过去成为自身永远无法摆脱的污点，一直对她在邻里间的形象与地位产生了不良影响。当金穆蓉在与她争吵时，便会毫不留情的戳破：“有本事出广安门，回莲花池卖您的烂炕席去，别在这儿寒碜自个儿了。”²⁶这种话语暴力，正是女性在日益强化规训下的体现，不仅丢掉了真正的“自我”，使其无法找到她们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²⁷田翠兰虽然表面强悍，在争吵时会用“阿弥陀佛”和泼

²⁴ 孙米莉，〈空间、知识和权力——基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的文本解读〉，页 48。

²⁵ 刘恒，《窝头会馆》，页 36。

²⁶ 刘恒，《窝头会馆》，页 20。

²⁷ 王瑄，〈凝视、话语、规训——福柯权力视域下女性的自我献祭〉，《名作欣赏》2022年第17期，页 91。

辣的语言进行反击，但实际上在其内心中，“暗门子”的过去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不堪回首的阴影，成为了她永恒的伤痛与挣扎的来源。她的身体，在过去作为能够生存的工具；而在如今却成为了被道德规训所标记和惩罚的对象。

三、 具体情节中的规训实践：婚姻、劳动与身体

刘恒通过《窝头会馆》的故事，生动形象的向大众展示了规训权力在女性婚姻、劳动和身体控制上的实践。

首先是在婚姻的选择上，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剧中田翠兰为了自己“养老”能有保障，选择让关福斗作为上门女婿娶自己的女儿王秀芸。王秀芸几乎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力，她的婚姻是家族生存策略的一部分。还有周子萍与肖鹏达，肖鹏达为了能让周子萍嫁给自己为妻，他用偏执的方式对周子萍进行纠缠并逼婚，会想通过给予高跟鞋、飞机票等物质品以及暴力手段，如持枪威胁来强行占有周子萍。这样的行为体现出了父权制度下男性将女性视作附属品的规训逻辑。最后是金穆蓉，她虽然在肖鹏达持枪逼婚以及为了避免周子萍有“通共嫌疑”而阻止其参与学生活动时想要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受伤害；但实际上，她这并不是对女儿个人意志的尊重，更多的是对家族安全的担忧以及具有“认命”的传统观念。

在劳动方面，女性的工作被严格区分并且拥有不同价值。田翠兰的劳动是典型的底层女性劳动：她所做的是一些琐碎、肮脏并且与家庭再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如洗猪肠、做炒肝、捏窝头、洗衣裳等，所以是被视为“自然”的女性职责。金穆蓉作为中医的妻子，虽然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但她需要经营药材，制做膏药来贴补家用；甚至在她走投无路之时，会冒险从事接生的工作。所以她的劳动虽属于智力型但同样是因为生存压力而产生的。而周家女儿——周子萍，作为左翼大学生所参与的学生运动，则属于是政治性、公共性的劳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行为对女性而言是充满危险且不被家庭所支持的。

规训权利在身体控制层面上的表现最为明显。剧中王秀芸因为怀孕导致她被全家严密监控和保护，在全家看来她的身体已经成为家族传承的容器，所以她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另外还有金穆蓉，她试图通过宗教信仰来净化和管理自身与其家人的身体与灵魂。她每日都进行的祈祷以及画十字的行为，不仅是一种自律，同时也是对超越性规范的服从。

总的来讲，《窝头会馆》中所描绘的社会环境使得家庭和邻里成为了规训女性的空间，传统性别角色与道德观念则像无形的大网，通过婚姻安排、劳动分工和身体控制等一系列行为，让女性被塑造为符合特定社会规范的“驯顺的身体”。她们挣扎、反抗与妥协的行为共同谱写了一曲在规训权力网络下的生存悲歌。

第二节 规训下的挣扎与牺牲：女性坎坷命运的表现

福柯理论中提到“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²⁸《窝头会馆》中几位主要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命运轨迹被深深地烙上了规训权力的印记。她们的悲剧色彩不是源于单一的恶人或偶然事件，而是因为无所不在的规训机制对其欲望的压抑、自主权的剥夺以及身体的规训与惩罚。

一、田翠兰：被规训的身体与未被驯服的灵魂

田翠兰是剧中形象塑造最为丰满且也最具悲剧色彩的女性之一。她的命运轨迹是从最开始身体被规训到后面部分觉醒与反抗的一条曲折之路。

（一）被压抑的欲望与情感

田翠兰曾做“暗门子”的经历，使她的身体和情感欲望从一开始就被社会道德冠上了污名。从良后的她虽与性格懦弱的王立本组件家庭，但在背地里却与邻居苑国钟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当她去催租时会偷偷给苑国钟“抛媚眼”，并且在苑国钟落魄时给予关怀甚至可能是身体上的慰藉。然而，这种关系始终是地下的、见不得光的以及被鄙夷的，更被金穆蓉称之为“现世报”。之后，二者的“恋情”被关福斗发觉，从而爆发了家庭冲突；她自身也产生了极大的羞耻感。她的情感欲望在强大的道德规训下，只能是以扭曲且隐秘的方式存在。

（二）被剥夺的自主权

田翠兰看似强势，并且掌控着西厢房的生计与家务。但实际上，她的自主权极其有限。她的不光彩过去奠定了她在道德话语体系中地位的低下，让她不得不时常处于

²⁸ [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页193。

防备姿态。她为了全家的生存而劳动，她不让雇佣小工的精打细算是为了应对飞涨的物价。所以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她的性格是泼辣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然而当肖保长要求她的女婿去修机场时，她虽奋力抗争，甚至下跪哀求，但却依旧无法改变结局，最后只能用金钱代役。在强大的权力规训下，她的反抗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三）身体的受苦与最终的“认”与“仁”

过去的田翠兰因一家死于瘟疫为了生计被迫卖身，而现在的她每天操持家务。她的身体不仅承载着过往的苦难，同时也承载着当下的辛劳。在剧本中，她因抬棺材而导致扭伤肩膀，周玉浦为她正骨时疼得龇牙咧嘴，这正是因其身体长期操劳的表现。然而，在规训带来的痛苦中，田翠兰依旧展现出底层女性坚韧的生命力与未被完全泯灭的仁爱。她的命运虽是被规训的悲剧，但也有着对规训的有限突破，而这就体现在其基于生存本能与底层道义的“仁”之中。苑江淼时她曾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在苑家父子因捐款爆发激烈冲突、苑国钟中枪垂死时，她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为了接生能与夙敌金穆蓉短暂和解。这一刻，超越了日常的规训与争斗，闪耀出人性在绝境中的光辉。

二、金穆蓉：规训的内化与精神流亡者的困境

与田翠兰不同的是，金穆蓉的悲剧更在于其对规训权力的内化，以及在这种内化中的精神痛苦。

（一）身份规训下的焦虑

金沐蓉作为没落旗人“大格格”和天主教徒，她一直规训自己保持洁净、恪守教规，也试图以此规训丈夫与女儿。虽然曾经身份已没落，但她始终生活在对往昔身份与秩序的怀念与坚持中。她对田翠兰鄙夷的态度，不仅是源于道德优越感，也是因为自身阶层滑落而不得不与“下等人”为邻而产生的焦虑感。她将家庭的部分困境归咎于丈夫的无能与社会时局；但更为深层的则是她无法接受自身身份在新时代中的失效与崩塌。而她所信仰的天主教是她此时维系内心秩序、对抗现实混乱的最后堡垒。但是当她祈求“上帝垂怜”女儿却身陷险境，当她得知丈夫描述学生挨揍反而为他带

来生意时，信仰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撕裂，因此她“对着镜子薅头发”²⁹，精神也陷入了崩溃边缘。

（二）被剥夺的自主权

剧中金穆蓉对女儿周子萍的控制，实际上是披着“爱”与“保护”外表的规训。因为害怕女儿被卷入到政治风波而遭到迫害，从而禁止她与苑江淼接触，还有试图将她安排到舅舅家避难。甚至是在面对肖鹏达的逼迫时，最先想到的不是抵抗，而是妥协与认命。这种对女儿的控制，不仅剥夺了周子萍个人的选择权，更是金穆蓉对传统家庭模式执着的体现，以及对失去掌控时感到的恐惧。在整部剧中，她试图将女儿规训成一个符合传统规范的“大家闺秀”，但这却与女儿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最终，当金穆蓉跪地祈祷却无法做出任何改变时，她所依赖的一切规训，都显得苍白无力，而她也成为了一个精神的流亡者。

三、周子萍与王秀芸：不同时代女性的规训差异

追求新理想的周子萍与遵循传统的王秀芸，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时代特点。从她们两人的对比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规训机制在面对不同时代女性时所展现出处的差异和普遍性。

王秀芸在剧中是一个沉默的承受者，是传统女性规训下的典型产物。在剧中她几乎没有向外界表达过自己的个人意愿，她所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承接住“母亲”与“妻子”的身份。在剧中王秀芸作为孕妇仍要收拾刨花以及抬棺材盖“您出来给搭把手儿……小子一人儿挪不动！”³⁰并且她在整部剧中的台词也是极少的，大多话语都是做一个简短的回应，例如收拾刨花时“赔您个什么您才乐意呢？”³¹以及在面对母亲田翠兰与苑国钟暧昧被发现时说的“妈！您……”³²这些剧中的情节都体现了王秀芸的不主动和不反抗，这些行为恰好体现出了当时底层女性“守本分、能隐忍”的特质。王秀芸的命运轨迹，就像是众多在家庭空间中被规训的妇女默默承受的缩影。

²⁹ 刘恒，《窝头会馆》，页 39。

³⁰ 刘恒，《窝头会馆》，页 32。

³¹ 刘恒，《窝头会馆》，页 17。

³² 刘恒，《窝头会馆》，页 36。

周子萍在剧中代表的是面对规训的反抗者，她代表着那些试图冲破规训的新一代女性。剧中她是一个单纯而浪漫且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左翼大学生，同时她也经常为苑江淼传递进步书籍与传单。正是她的这些行为，成为了她反抗家庭规训、性别规训以及政治规训的体现。在感情方面，她与苑江淼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而产生精神上的共鸣，继而超越了传统的男女关系模式。也正因如此，她的反抗必定存在着风险与悲剧性。周子萍参加的学生运动时刻面临着被捕的风险，这也让父母担惊受怕，同时她还处在了肖鹏达偏执追求的威胁之下。在剧中结尾，她坚定的站在了苑江淼这一边，轻蔑的回绝肖鹏达，以此展现出了新女性的勇气。她的命运指向未来，但也预示着打破规训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她是剧中唯一一个可能走向“新中国”的女性，象征着在规训权力的缝隙中，新时代群体成长的艰难与希望。

四、 规训机制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通过了解剧中这几位女性角色的命运，可以看出规训权力是存在普遍性和差异性的。普遍性在于，无论贫富如何、老少如何、信仰如何，女性群体都无法完全逃脱父权社会、传统道德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压力的规训。她们的身体、欲望、精神都被这套机制所管理与塑造。而差异性则体现在规训的方式与重点上，当面对田翠兰这样的底层女性时，规训选择直接作用于她的身体和道德上。而面对金穆蓉这样的没落贵族时，规训又侧重于她的身份认同和精神把控。面对王秀芸时，规训则专注于她的生育功能。在面对周子萍时，规训则又表现为对其政治倾向与情感上的压制。然而，无论是反抗还是默默忍受，这些女性角色的命运都充满了被规训的坎坷与悲剧。

第三节 小结

通过对《窝头会馆》中女性书写的分析，可以清晰的了解到，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为解读这些女性的生存状态提供一个有力的视角。剧中所展现的家庭空间、社会规范以及道德观念，一同织就了一张规训的大网。田翠兰、金穆蓉、周子萍、王秀芸等女性角色，她们所经历的坎坷命运，不仅是个人性格的偶然结果，更是特定社会背景下规训权力作用于个体上的体现。刘恒通过塑造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不仅展现出了旧时代底层人民的苦难，同时也揭示了权力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小事塑造一个人的身体与灵魂的。

第三章 “话语权力”视角分析《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

福柯在其“话语权力”这一理论中深刻的揭示了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即权力是如何通过话语体现出来的。刘恒通过对剧中的女性角色进行细腻的刻画，描绘出了一幅充满话语张力的社会图景。本章将运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剧中的女性角色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处境以及背后隐藏的深刻意涵。

第一节 “话语权力”在女性角色塑造中的体现

一、话语权的分配

在《窝头会馆》这部剧中，刘恒为其精心构建了一个有着鲜明权力等级的语言生态。在这个生态中，不同层级的人对话语权的分配也截然不同。在福柯的观点中，我们既能够实施话语权力，又能够被话语权力操控。³³而在这样的局势下，我们都处在一个巨大的话语权力之网中，在这个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话语的权力。正是在这样一种层层权力交织的网中，女性往往容易成为被话语权力操控的主体。剧中的女性角色虽然从表面看上去有能够发声的机会，但她们的声音却往往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

剧中的田翠兰生动形象，以其她的说话方式最具有代表性。在剧中多表现为声音洪亮，让观众都以为其拥有充分的话语权，但在实际情况中，她却被限制在了“泼妇”这个话语框架内，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多话语权。当她和金穆蓉在争执时，金穆蓉通过点出其曾为“暗门子”的身份，剥夺了田翠兰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力的剥夺并不是通过强制沉默实现的，而是通过将对方定义为“不洁”、“不体面”实现的。

与之形成对的是金穆蓉的说话策略。其作为曾经的旗人和天主教徒，通过这些身份获得了某种话语特权。在剧中她的话语中通常带着一种优越感，通过这些形式上营造出的阶级话语，构建自己的阶级地位，但细察之下，可以看出金穆蓉这些表面上富有权威的话语，实则也受到了父权结构的限制，其自身需要通过“格格”的身份来巩

³³ 王瑄，〈凝视、话语、规训——福柯权力视域下女性的自我献祭〉，页 90。

固和加强自己的话语权，而非依靠于自身作为女性的主体性。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反过来话语也是权力的产物，而在话语的实践中也潜藏着权力的运作。³⁴金穆蓉正是通过这种自身曾经存在权力残留，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不多的话语权。

剧中的新一代年轻女性其话语困境也带有悲剧性。周子萍作为一个接受过新思想的大学生，理论上应该具有更多的话语空间，但在剧中，她话语空间始终被自己父母的担忧以及肖鹏达的纠缠所限制。当她对苑江淼表达关心时，被母亲严厉喝止：“几粒儿唾沫星子都能染上痨病，你凑那么近不是自找是什么？”³⁵在这里，周子萍的话语权被“健康”这个看似合理的理由所限制，实际上反映出的则是在父权社会下男女交往中，女性的话语权基本丧失。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话语的生产都是根据一定数量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³⁶在窝头会馆这个微缩社会中，女性话语权的分配恰恰印证了这一观点——谁有权说、以何种方式说、说什么，都受到了权力结构的管控。

二、话语作为权力运作的工具

在《窝头会馆》中，话语不仅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权力运作的载体。话语权力表明，只有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话语才具有权力本质，而纯粹的语言本身并不具备权力特征。³⁷同时在福柯的观念中“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围绕着权力关系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³⁸正是剧中人物通过各种各样的话语策略来争夺权力的位置，致使女性角色成为了这些话语争斗的主要目标。

（一）田翠兰

流言和名誉控制可以说是剧中最为明显的话语权力的展现，同时污名化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运作方式。在剧中，田翠兰的身世不断被提及，这也成为了攻击她的有效武器。在第一幕中，金穆蓉与田翠兰争执时虽然没有直接挑明，但双方都知道这个身

³⁴ 王琛，《女性话语主体的建构及其可能性——福柯话语权力下的女性主义》（郑州：郑州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页15。

³⁵ 刘恒，《窝头会馆》，页28。

³⁶ 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页3。

³⁷ 王红薇，《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视角浅析《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权力机制》（昆明：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1），页7。

³⁸ [法]米歇尔·福柯著，余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22。

世所带来的影响。这种流言的伤害不在其真实性上，而是它具有塑造他人社会形象的能力。正如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探讨的“坦白技术”即“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³⁹通过强迫个体坦白自己的“真相”成为权力运作的工具，剧中田翠兰的过去便不断的被要求“坦白”，这也成为她永远无法摆脱的道德枷锁。同时，“暗门子”这个标签，不仅定义了她的过去，同时也影响着她当下的社会地位，无论她如何努力生活，也摆脱不了这个标签。第二幕中矛盾激化时，金穆蓉更直接以“往男人身上蹭”⁴⁰暗示田翠兰的不检点，金穆蓉正是通过污名化的策略来削弱田翠兰的道德地位。

（二）周子萍与金穆蓉

剧中金穆蓉对周子萍的管教，以及对田翠兰生活方式的鄙夷，其表现出来的实际是金穆蓉在话语上对两人实施的权力规范。当她训斥周子萍：“你不是小丫头儿了，说话办事要稳当。有什么事儿不能站在底下说，非得凑人家跟前儿去？”⁴¹时，实际上是一种对女性行为的规范准则，这种看似关心的训斥，本质上是父权体系下对女性身体和行为在话语层面的规训。相较于这类规训，宗教话语也能够成为权力争夺的载体。金穆蓉与田翠兰常说的“哈路利亚”以及“阿弥陀佛”在剧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差异，更是不同权力群体之间的抗衡。金穆蓉以天主教为自己的信仰，在第三幕中，她绝望的跪地祈祷“上帝垂怜！我求求您了……您要真能看见我们这些羔羊，您就来救救我们吧……哈路利亚！”⁴²这时的宗教话语则成为了她的慰藉。《窝头会馆》展现出了这些话语是如何在权力的驱动下，限制女性话语空间和定义社会身份的。这是这样一张无形的大网，牢牢的将女性困在其中。

三、女性角色的话语建构

在《窝头会馆》的话语结构中，女性角色被各种话语描述成各种类型，这些话语不仅来自于男性，同时也来自女性群体本身。在福柯眼中，人是话语构建的产物。⁴³剧中的女性形象正是由这些话语相互交织塑造出来的。

³⁹ [法]米歇尔·福柯著，《性经验史》，页 43。

⁴⁰ 刘恒，《窝头会馆》，页 20。

⁴¹ 刘恒，《窝头会馆》，页 28。

⁴² 刘恒，《窝头会馆》，页 46。

⁴³ 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 37。

（一）“贞洁女子”与“不洁女子”

“贞洁女子”与“不洁女子”的对立是剧中较为明显的话语建构。金穆蓉通过强调自己曾经的旗人身份和天主教信仰，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贞洁女子”的形象。她注重礼仪，讲究体面，试图通过这些表象的展现来巩固自己的道德地位。而田翠兰则被塑造为“不洁女子”，她的过去成为她无法摆脱的缺陷。

当然，这种形象的塑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田翠兰对苑江淼展现出无微不至的照顾时，她从“不洁女子”转变为了“慈母”的形象。而金穆蓉在冲突中说出的粗俗之语，“你……你才是蛆呢！往哪儿拱我也知道我们家门板的朝向，黑更半夜的，我不会睁着眼往人家门框里钻。”⁴⁴也让她努力维持的“贞洁女子”的形象有所崩塌。

（二）“泼妇”与“贤妻”

“泼妇”与“贤妻”的话语建构同样能够看出话语对女性角色塑造。田翠兰为人直率、行为泼辣，符合传统社会对“泼妇”的理解。然而，通过剧中的对其行为的仔细观察，这么做的原因大多数是为了保护家人和维持生计。当她为了保护女婿关福斗不被征工，而向肖启山下跪哀求“他肖爷！您是他亲爷爷是我亲叔儿！我给您磕一个……”⁴⁵在生活中行事泼辣的田翠兰甚至提出“磕一个”，试图通过卑微哀求的方式换取对方让步，这里不仅体现出了底层人物在强权压迫下的无奈，也展现出了她“泼辣”背后隐藏的是深深的母爱。与之相对，金穆蓉表面上符合“贤妻”的标准，做到了持家有度，育女有方，但在第三幕中，可以看出她对周子萍的控制已经超出常理，这也变相揭示出了金穆蓉“贤妻”形象背后强大的控制欲。

第二节 “话语权力”中女性角色背后的深层意涵体现

一、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

在《窝头会馆》中，女性角色之间对话所产生的争斗并不是简单的言语上的冲突，

⁴⁴ 刘恒，《窝头会馆》，页 20。

⁴⁵ 刘恒，《窝头会馆》，页 15。

而是深层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的体现。在剧本中，女性角色的话语处境就揭示了父权制度和阶级秩序等深层权力结构的运作机制。

父权制度下男性通过定义女性、控制女性的身体和性以及限制女性的言说空间来维持性别权力秩序。作为意识形态结构的核心，父权制度渗透在剧中的各种对话之间。例如，剧中肖启山作为保长和父权代表，不仅控制着物质资源的分配，也掌握着话语的定义权。此外，父权制度不仅是通过男性对女性的控制而实现，也是靠女性对于父权价值观的内化和实践来巩固。例如：金穆蓉对周子萍的严格管教，还有田翠兰对于女婿传承香火的重视等，这些都是父权制被女性内化的表现。

此外，阶级秩序与性别秩序的交织存在，共同构成了剧本中更为复杂的权力网络。例如金穆蓉从始至终对于田翠兰的鄙夷与不屑不仅源于道德优越感，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源于阶级优越感。金穆蓉作为曾经的旗人格格，虽然家道中落但她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阶级身份，并且通过这层身份来获得象征资本。在剧本的第二幕中，她因田翠兰祈求肖启山，别让自己的女婿去修机场而讽刺田翠兰：“我们家倒是想出一口子，可惜了儿缺您那个福气，现找个倒插门儿的壮丁，怕是也不赶趟儿了……”⁴⁶这段嘲讽不仅攻击了田翠兰的道德，也暗示了其需要依靠招赘女婿来维持家业的这样一个较低的阶级地位。然而虽然田翠兰处于阶级底层，但也会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和生存智慧来争夺话语权：“我一撇嘴她不得叨住我鼻子？上回洗猪肠子，脏水沁了她药材筐箩，愣讹了我半袋儿白面！”⁴⁷

除了上述的父权制度、阶级秩序和性别秩序外，剧中的宗教话语与世俗权力的勾连也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宗教信仰本应超越世俗的差异，但金穆蓉却将自己信仰的天主教视为她区别于、优越于他人的符号资本。她通过“画十字”的宗教仪式和“哈路利亚”的宗教语言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且与“他者”划清界限。又或是田翠兰通过供奉弥勒佛这样的民间信仰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剧的第二幕中，她们两人分别在门框上钉上了十字架和弥勒佛，这样的举动象征了不同信仰体系间的话语竞争，同时揭示出了宗教是如何被挪用为日常权力斗争的工具的。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指出，权力并非单一的压制性力量，而是多元的流动的关系网络。⁴⁸《窝头会馆》的

⁴⁶ 刘恒，《窝头会馆》，页14。

⁴⁷ 刘恒，《窝头会馆》，页5。

⁴⁸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39。

背景虽然只是一个小院，但各种权力形式存在其中，如父权、阶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他们的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幅复杂的权力的流动关系网。在这其中，女性角色并不只是简单的受害者，她们也是在这个权力网下努力寻找生存策略的行动者。她们的行为无论是顺从，还是抵抗，又或是利用一种权力形式对抗另一种权力形式，都展现出了她们独特且丰富的生存智慧。

二、反抗的可能性与局限

福柯理论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严密的话语权力网络中，女性是否具有反抗的可能性？《窝头会馆》中女性角色的行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在剧中，女性角色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话语反抗，这些反抗虽然存在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动摇了固有的权力结构。

首先，语言上的反讽与挪用是剧中女性角色重要的反抗策略之一。当田翠兰面对金穆蓉的道德指责时，她并没有直接否认与反对，而是采用自嘲和反讽的方式来化解金穆蓉的攻击。之后在金穆蓉又暗示她不检点时，她则骂到：“找我呀！您让讹您那孙子找我，您让他讹我来。谁怕谁呀？想变着法儿讹我，他姥姥！”⁴⁹这种粗旷的语言是对文雅语言体系的挑战。

剧中身体的自主权争夺则是另一种反抗形式。例如田翠兰无论是曾经的“暗门子”工作亦或是后来的劳动，都体现出了其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以及一种身体自主性。第三幕中王秀芸生育的痛苦和新生儿的哭声，都是女性身体既受规训又具有创造力的双重性的一种展现形式。除了这两位之外，看似最受控制的金穆蓉也会通过守斋、祈祷等宗教信仰活动中对身体的规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精神自主。

虽然女性角色进行了反抗，但是这些反抗都具有局限性。例如，田翠兰在反驳金穆蓉时，采用了道德攻击的策略：“您闭着眼请人家往自己的大门儿里钻……您还有什么说的？还他妈说什么呀！”⁵⁰这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策略，虽然能在具体争论中占据上风，但却在无形之中强化了原有的权力逻辑，让女性的反抗陷入“以父权之道还治父权之身”的困境。

还有，剧中女性角色的反抗通常都是个人化、零散的，很难团结形成集体力量。

⁴⁹ 刘恒，《窝头会馆》，页3。

⁵⁰ 刘恒，《窝头会馆》，页20。

田翠兰和金穆蓉之间的矛盾，就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她们的对抗父权制的注意力。当她们产生矛盾继而相互攻击时，这时如肖启山代表的政权和苑国钟代表的房主权，这种真的权力核心反而得到了巩固。在第三幕中王秀芸面临生命危险，金穆蓉选择放下成见协助其接生，

金穆蓉：“给找个大点儿的碗”⁵¹

金穆蓉：“我拿它盛酒精使……得把剪子泡进去”⁵²

金穆蓉：“拿开水沏点儿碱面儿，把脏爪子都好好洗洗！”⁵³

田翠兰：“哎！我听您的……（紧随对方进屋）什么都听您的”⁵⁴

这时的女性角色之间才出现了短暂的和谐与团结。这种合作与团结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暗示着女性之间联盟的可能性。

但在剧中最具启示意义的反抗方式则是周子萍所代表的年轻一代。周子萍作为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大学生，她通过参与左翼学生运动，从而寻求体制外的反抗途径。剧中她为苑江淼传递进步书籍，参与传单的印制与散发，这些行为早已超越个人反抗的范畴，而是指向了集体性的社会变革。第三幕中肖鹏达发现地上有传单时，周子萍丝毫没有慌乱与畏惧，而是坚定地跟苑江淼一起收拾传单，这一幕象征着她对新的主体位置的追寻。

福柯在谈论反抗时认为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反抗，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抗外在于权力，实际上反抗是权力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窝头会馆》中女性角色的反抗并不是对权力彻底的拒绝，而是选择在权力网络内部寻找缝隙和可能性。她们的这些反抗行为虽然无法从根本上颠覆权力结构，但也在持续地协商、挑战、重塑着权力关系，尽可能的为女性争取有限的自主空间。

⁵¹ 刘恒，《窝头会馆》，页 49。

⁵² 刘恒，《窝头会馆》，页 49。

⁵³ 刘恒，《窝头会馆》，页 50。

⁵⁴ 刘恒，《窝头会馆》，页 50。

三、 话语对主体的塑造

福柯权力观的核心突破在于指出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更是生产性的——它生产知识，生产话语，也生产主体。⁵⁵《窝头会馆》中的女性角色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的、一成不变的人物。而是在其他角色语言的不断影响下，被塑造出来的。这种塑造方式不仅是一种规训，同时也为女性的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可能性。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阐述了“规范化裁决”如何通过微小的惩罚，使个体自觉遵从社会规范。⁵⁶剧中金穆蓉对周子萍的训诫，田翠兰对王秀芸的保护，这些行为都是规范化权力的体现，她们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在无意识中，把一直束缚着她们的规则用在了自己的女儿身上，让这些规矩看起来天经地义、永不改变。另外，田翠兰的身份被定义为“暗门子”、“泼妇”，金穆蓉被看待为“格格”、“贤妻”，周子萍是“女儿”、“学生”。她们身份的定位不止来自于外部定义，也是她们在不同程度上内化为了自我认知。

然而，权力和抵抗是相伴存在的。权力不能完全消灭抵抗，只要权力试图去塑造和控制，那么它就必然会在同一时刻滋生出反抗的力量，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田翠兰虽被视为“不洁”之人，但她却发展出了一套独属于其自己的生存智慧和伦理准则。她对苑江淼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女婿的真情保护，对苑国钟困难时的帮助，这些行径都展现了一种超越传统道德评判的女性伦理。这种人生态度并不是和主流社会“唱反调”，而是选择用自己的规则活出自我，进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独立的“我”。

剧中最为戏剧性的是话语对女性主体性的矛盾塑造。金穆蓉一直选择信仰天主教从而获得救赎，但在危急关头时她却发现信仰并不能真正解决她的困境。田翠兰想要通过勤劳的劳动和泼辣性格的塑造建立起新的自我价值，然而她始终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周子萍想要通过进步思想寻求解放，却不得不面对肖鹏达的纠缠和父母的担忧。这些矛盾揭示出剧中的女性并不能完全自我做主，但也不是完全被操控的“傀儡”。她们更像是在社会规则、自我期望和他人意愿的缝隙中，不断选择与平衡的人。

⁵⁵ [法]米歇尔·福柯著，《性经验史》，页 75。

⁵⁶ [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页 208。

福柯晚期关于“自我技术”⁵⁷的思考为理解女性主体性提供了新视角。在剧中可以看到女性角色通过各种自我技术从而构建了主体性，如田翠兰通过劳动和关怀他人证明自我价值；金穆蓉通过宗教信仰和规矩从而维持自我认同；而周子萍则选择通过政治参与实现自我追求。这些自我技术虽受制于权力结构，但却也为女性的主体化提供了可能途径。

剧终时新生儿的哭声和苑国钟的离世，标志着女性角色面临着重新定义自我的契机。田翠兰需要继续操持家庭，并照顾刚出生的孙儿；金穆蓉需要重新考虑与女儿的关系；而周子萍则更加可能地坚定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这些开放性的不确定暗示，象征着角色的定义并不是不变的。而是在面对各种要求或期望或内心挣扎时，一点点被塑造出来的，并且是会一直改变下去的。

第三节 小结

通过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解读《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话语如何成为权力运作的媒介，女性角色如何在话语中被建构、规训，又如何通过话语进行反抗。

《窝头会馆》中的女性书写启示我们，话语权力并非单向的压制机制，而是充满矛盾和裂隙的。女性既是话语权力的对象，也是话语实践的参与者；既被话语所塑造，也通过话语重塑自己。在规训与反抗的辩证中，女性主体得以不断生成和演变。这种对女性处境的深刻洞察，不仅丰富了戏剧的艺术价值，也为理解性别与权力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⁵⁷ 自我技术指的是“允许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或通过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进行一定数量的操作，从而改变自己，以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

第四章 结语

《窝头会馆》作为一个展现了旧时代生存风貌的话剧，其中有很多女性角色的行为或对话值得去研究和挖掘其中的深刻内容。通过初步研究笔者发现，在旧时代的中国，女性命运通常不是由自己所掌握，大多被时代所裹挟。在剧中每一位女性都有着自己的困境，但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之后王秀芸分娩时喊出的“新中国”也代表着新时代与旧时代的交替，与该剧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立意相呼应。刘恒通过自然写实的笔触将剧中的女性角色与社会的发展融入到一起，虽然过程充满绝望，但在其中却隐隐闪烁着希望的亮光。

第二章以福柯“规训权力”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分别从社会环境以及个体命运两个方面对《窝头会馆》的女性书写进行分析。在社会环境中，家庭和邻里组成了规训空间。同时婚姻、劳动以及身体的控制成为了传统观念规训女性的手段。在个体中，田翠兰、金穆蓉等角色有的挣扎有的将规训内化，不仅展现出了规训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同时也揭示了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第三章通过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揭示了话语是权力运作的工具。在女性形象建构的背后，是父权、阶级等权力作用于女性身体的隐现。在剧中出现了女性对权力的反抗，虽然存在局限性，但展示出了特定社会环境下女性的复杂处境和深层意涵。

最后，无论是过去还将来，女性要依附于男性生存这一传统观念，都会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想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笔者认为只要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人，无论男女都有追逐自由与独立的权力，女性不必依附男性，男性也不必苛求女性。实现平等的过程是漫长的，但重点是要自己实现觉醒并完成自主与独立，这样才能够做到推动社会的变革。其关键点在于这不是挑起两性的对抗，而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合作，这样才能够让每个人都能从“男尊女卑”这样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

参考文献

专书

- 1、甘海岚、张丽航著，《京味文学散论》，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 2、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刘恒，《窝头会馆》，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09。
- 4、马森，《戏剧：造梦的艺术》，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
- 5、王先霏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6、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7、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文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译著

- 1、[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2、[法]米歇尔·福柯著、余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学位论文

- 1、戴蓓芬，《福柯主体理论及其女性主义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2、范莹莹，《从权力/身体看福柯与女性主义》，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 3、王琬，《文本细读法在高中戏剧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探究》，聊城：聊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 4、王琛，《女性话语主体的建构及其可能性——福柯话语权力下的女性主义》，郑州：郑州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 5、王红薇，《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视角浅析《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权力机制》，昆明：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1。

期刊

- 1、曹晨光，《悲惨命运的女性书写》，《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页100-101。
- 2、何明敏，《去雅从俗的“京味”话剧《窝头会馆》》，《当代戏剧》2015年第2期，页16-18。
- 3、罗雅文，张跃勇，《浅析《窝头会馆》的艺术特色》，《曲艺杂谈》2017年第7期，页57。
- 4、刘思谦，《关于中国女性文学》，《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页61-70。
- 5、孙米莉，《空间、知识和权力——基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的文本解读》，《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页46-50。
- 6、谭梅，《社会性别维度下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女性书写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页62-68。
- 7、王瑄，《凝视、话语、规训——福柯权力视域下女性的自我献祭》，《名作欣赏》2022年第17期，页89-91。
- 8、周菊芹，《北京人艺话剧《窝头会馆》中小人物生存困境解析》，《戏剧文学》2018年第3期，页87-90。

网络资料

- 1、中国青年报，《作家刘恒打造《窝头会馆》》，2009年8月18日，浏览于2025年7月23日 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9-08/18/content_2808821.htm